



主 编 王建朗
副主编 马振犊 张俊义

中华民国时期 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

第十卷

下

中华书局



国家图书馆

分卷主编 陈开科

中华民国时期 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

第十卷

下

中华书局

二、中苏关系

说明:1944年—1945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发生声势浩大的三区革命,新疆各族人民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但是,革命初期,革命领导权为封建宗教上层所控制,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但具有民族分裂的倾向,且对苏联产生政治上的隐忧。最终,在苏联的全力斡旋下,中苏合力和平解决了“伊宁事件”,取缔了分裂政权,维护了中国疆土的统一。但是,同样由于苏联的支持,民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此时中国非仅边疆不宁,内地亦因国共之争局势趋于恶化。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但节节失败,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中国国共两党角逐情势的变化,加上美、苏矛盾的激烈,苏联慢慢将对华政策的重心倾向中共。1949年初,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苏联与中共开始了秘密外交。同年1月联共(布)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6月中共派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使中共慢慢确立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0月2日,苏联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开启了中苏关系的新时代。

本章主要资料来源^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

^① 部分俄文翻译过来的资料,为方便利用,时间标记为俄历,俄历比公历迟13天。如5月12(25)日。

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

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四册,新疆卷(一)、(二),2001年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年7月—1950年3月)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俄]A. 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

[俄]A. M. 列多夫斯基编,李玉贞译:《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中央日报》1945—1949年

《人民日报》1949年。

(一)中、苏有关新疆问题的交涉

说明:1944年发生的三区革命是新疆各族人民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反对国民党暴政的革命斗争。但革命初期,领导权落入封建宗教的上层手中,成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出现了民族分裂的倾向,终引起中、苏两国的重视。最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中、苏两国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平解决“伊宁事件”,民族分裂倾向被制止,中国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此后,中苏两国恢复经济合作谈判,在新疆加强了地区经济合作。1947年,中蒙发生边界冲突“北塔山事件”,国民政府处置不当,导致中苏关系趋于恶化。

1. 伊宁事件的和平解决

盛世才致蒋介石函

迪化,1944年4月28日

委座钧鉴:窃自苏方策动哈民叛变,以苏蒙之陆、空军侵新以来,迭承钧座垂眷,勉策有加,复屡奉亲笔手谕,详示机宜,仰见钧座日理万机,无微不至,俾职有所遵循,铭感曷极,又蒙派朱长官来新,当面指示机宜及调派精锐三师入新,分屯驻守,拱卫边疆,并拨发械弹器材补充军实,使职及边省武装同志一致感奋,十四宗族咸戴德威,职惟有率领军民,誓守疆土以报党国,以报钧座知遇之恩,以不负钧座期望之心。兹将目前情形略陈于次:查蒙卡现驻有苏蒙军约壹千四百人,哈匪活动之壮丁约有壹千五百人(配属枪枝者约七百人),判断其目前企图以先取富蕴,积极夺占阿山区为其侵新根据地。

其军事策略,虽因我中央抗议及国际舆论并甘肃军队陆续入新关系而暂行停止空军轰炸行动,然在陆地方面,除积极补充哈匪步枪外,并增加轻重机枪、掷弹枪、自动步枪等火器,使用自动火器及指挥哈匪作战之指挥官,均系苏联与外蒙人。

其在政治策略方面,亦有整个阴谋计划。刻在省城方面已获苏方组织之游击队员及共产党秘密组织,除对省城方面日夜加紧审讯,陆续逮捕,积极肃清反动份子外,对外区已派警务处长李英奇驰赴南疆侦查,复派警务处副处长张光前驰赴阿山侦察,以便加快肃清其他各行政区之反动份子。

职目前对苏蒙政治阴谋之对策,系采取积极肃清内部之反动份子,特别是加快肃清游击队秘密组织及共产党秘密组织,同时并极力把握各宗族头目阿洪以及有声望者,以减弱苏方活动力量,加强各宗族对国家民族观念。

至对苏蒙哈匪军事活动之对策,系一方积极进行剿办窜入新境之

苏蒙哈匪,一方在解富蕴之围后,对由富蕴至承化间之要点,及由富蕴至福海间之要路,均驻扎相当兵力,以防堵蒙哈匪窜扰阿山,以打破其夺占阿山计划。

以上两项对策如有不当之处,敬祈钧座详加指示,以便遵循为盼。再舍弟世骥曾奉核准赴渝报告一切,现以分团有些干部被捕,暂时不克离迪。至职所有应禀钧座事项,均请朱长官代为禀陈。

再据吴特派员函称,阿拉木图领馆消息,谓苏方派十三人秘密入新,专以行刺为目的等情,职除飭有关机关严加注意外,深恐奸党对我党国要人应必有谋刺之阴谋,更因本党党员众多,难免不无奸党份子混入,当此时局复杂之时,特请钧座在饮食起居方面多加注意,函此敬请钧安。职盛世才谨禀。卅三年四月廿八日晚十一时。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61—462页

高思致赫尔电

重庆,1944年10月9日

阁下:关于所称新疆省哈萨克人劫掠一事,大使馆8月24日下午1时1451号电报及此前函电计已收到,谨将驻迪化领事1944年9月23日电报内有关此事之情报呈报如下。

该领事称,据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报告,约30名哈萨克人于1944年8月31日从塔城以东约90公里,离俄国边界约10公里的乌什绥(Wushihshui)附近赶着300匹马;中国边境哨兵向离俄国边界约三四公里处开枪制止哈萨克人前进。哈萨克人向中国边防军还击;俄国边防军为呼应哈萨克人侵入中国领土一公里多,并协助哈萨克人从中国边防军包围中夺路;苏联边防军也对中国边防军开了火;苏联边防军和哈萨克人在被中国边防军追击中抢走了马匹;在此次冲突过程中有四名中国边防军受伤。

该领事报告内并称,据外交部特派员告知,位于伊宁东120公里的山区内的巩哈村从1944年9月17日起即被一队约60名哈萨克人

包围。

史密斯说,曾数次就所指控的苏联于本年7月及8月积极参与哈萨克人在新疆西部暴动一事的真实性询问该特派员,该特派员一再向史密斯保证说,经仔细核对证据,确信苏联参与的说法是可靠的。据史密斯说,外交部特派员认为,上述新发生的事件是“又一次神经战,意在促成将原有机构剩下的边境行政官吏解职。”

据重庆报导,向史密斯提供情报的吴霭宸被外交部召回,继任者为原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刘泽荣先生。一般认为,此项调动表明,中国政府将进一步任命受俄国人欢迎的人为驻新疆官员。

FRUS, 1944, Vol. 6, pp. 814-815

高思致赫尔电

重庆, 1944年10月19日上午8时

在11日电报中,驻迪化领事报告外交部特派员的消息:10月8日40名哈萨克人袭击了迪化以南8公里的地区;另有100多人袭击了迪化以北16公里地区,900多阿尔泰哈萨克人抢劫并焚烧了在迪化以北40公里的有城墙的阜康镇,日期不明;喀什西南两个边境碉堡被500名苏联兵和一些哈萨克人或吉尔吉斯人攻占,日期不明。该领事说,据报导,在最近一次袭击中一名幸存的人证实,他看到几百名用苏联新式步枪和刺刀武装的阿尔泰哈萨克人。据该领事报导,新任省主席说,他决心保持新疆和平和民族平等,第一步是用宣传而不是用子弹劝说哈萨克人停止袭击。

FRUS, 1944, Vol. 6, pp. 816-817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第503页

卜道明致蒋介石函

重庆, 1944年11月25日

司高磋代办答称:

一、苏联将用一切方法增进并加强中苏友谊及两国之合作，因中苏接壤五千余公里，两国必须合作，且无不能解决之争论。

二、新省在盛督办时代确曾发生敌视苏联国民之事实，致妨碍中苏邦交之增进，经潘大使通知贵方有案。此类事实，近来并未发生，此亦贵国政府调整新省人事之效果也。惟新省某些商人，仍不愿卖货物给苏联国民，谅系过去之残余情绪，不难纠正。

三、关于伊宁白俄（白归化族）之暴动，本人系于一星期前与阁下谈话中始获知悉，今竟几将伊宁城全部占领，实属不幸（该代办言至此，摇头，并低声骂“他妈的！”）。查该白俄等均系不愿回返苏联祖国者，彼等认中国较苏联为好，经贵国收容后，散居新省、东三省、上海、天津等处，一九三七年天津白俄曾将天津苏领事馆打劫一空，经向日政府（因当时日军已占领天津）提出抗议有案。迪化苏领事对于暴动情形，也许知之较详，阁下抵新后能与该领事一谈，当然更好，惟白俄虽系俄人，仅系语言上相同，彼等思想则全与苏联不同，究竟彼等企图如何，本人尚不知悉。惟相信苏联对于此等白俄之暴动，决不至有何种关系或支持，倘苏联人在新省有此种举动，苏联当用极严厉手段处置也。

四、关于新苏经济合作事，请先与巴固林代表一谈，因此系巴代表主管之事，必须先有商洽。

五、阁下关于新省问题之谈话，本人当报告莫斯科，并电驻迪苏领事欢迎阁下前往洽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62—463页

华德致斯退丁纽斯电

迪化，1944年12月10日

国务卿阁下：关于伊宁暴乱，在1944年11月16日至12月10日间本领事馆曾向驻重庆大使馆发出2至9号电（包括9号），11—21号电（含21号），24、28及29号电。电报要点想已转发国务院，现再就此事提出下列报告。

摘要:11月7日在新疆省西部离边境不远的伊宁市开始发生暴乱。参与暴乱的有哈萨克人,突厥人,鞑靼人和流亡新疆的俄罗斯人。暴乱者控制了伊宁,当时大部分中国驻军离开了伊宁去讨伐乱民,其余或被消灭或被赶回到伊宁市北一个大致成椭圆形的地区,中国人即在此以飞机场,空军部队兵营和奎旺寺为根据地,成功地进行防卫以迄于今。在暴徒推进到靠近飞机场西面的一个据点以前,被围困的驻军还有可能从空中得到物资和轻装备供应,但现在已不再可能,被迫将物资空投到旷野中。利用公路派遣增援部队受到延误,因为直到最近二台还在乱民手里,而二台是在霍尔果斯——迪化公路上的一个战略关口。中国人夺回这个关口,加以胡宗南部队的两个师从“关内”到达迪化,这使得新疆当局人士恢复了信心,在写此份报告时,他们认为不久就能将暴乱平息。此时,暴民似乎装备齐全,并且为他们所设立的“东突厥共和国”进行宣传,显然他们希望以全省穆斯林联合为基础反对占少数的汉人。中国人一致认为,暴乱是苏联煽起的,但是就俄国人的情况而言,他们本可以不必有所行动就达到所追求的任何目的,这样也就不会受到任何指责;他们似乎不会去做任何有损其地位,或给中国人本已过份的反苏指责火上浇油的事情。动乱更可能意味着对多年暴政的反抗。摘要完。

(以下为详细报告原文)

Ⅲ、归罪于苏联同谋

从暴乱开始以来,领事馆接触过的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内心里相信是苏联在共谋,有很多事也确实如此。在第一次拜访朱绍良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暴乱是苏联煽起的;朱将军断言,暴乱是红军节(11月7日)在伊宁市白俄居民区开始,是由一群具有中国公民身分但也在苏联领事馆秘密登记的白俄发动的。他说两名囚犯指出,白俄领导人是盛世才以前的俄国顾问波利诺夫。据朱将军说,造反者的真正基地是在俄国边境的霍尔果斯镇。在霍尔果斯和伊宁之间的水定也被造反者控制,他们经常通过这里和霍尔果斯接触,并且通过此路线接收从

苏联来的武器和物资。为了证明这些论点,他出示了一个 20 毫米反坦克、反飞机炮弹和 5 个 25 毫米口径的枪榴弹。

这位将军又说,造反者占据的位置在驻伊宁苏联领事馆周围和后面,使中国人很难对他们进行攻击而不冒破坏领事馆的风险。

在和朱将军第二次和随后的谈话中,他又将这些指责进一步发展。他说,苏联领事馆大院有围墙,墙上架设了很多机枪;这些机枪经常支持造反者;当有一架中国飞机通过大院时,受到大院以内的机枪射击。他还宣称,夜间可以看到水定——广仁——霍尔果斯公路上向暴民运送苏联物资的来往卡车不断闪烁的车灯。在一次谈话中,当问到在这些物资上是否有苏联字样的证据时,他出示一个机枪弹盒,一个金属子弹箱,几个反坦克炮弹,五六个小迫击炮弹,其它证据主要是一份护照,据说是在原先攻击伊宁警察派出所带队人的尸体上搜出的,这份护照已转交给外交特派员。当然特派员非常愿意向我们出示这份护照。

特派员吴霭宸不仅让我们看了护照,而且向我们出示了一份大概是由苏联驻伊宁领事发给持护照者的一份俄文请柬,请他于 11 月 6 日晚参加庆祝红军节晚会。特派员说,被邀参加这次晚会的有 300 名白俄,就是这 300 人于次日清晨全副武装去夺取伊宁。现正将这些证据和一份详细报告送给蒋委员长。

和每一个能来到我的办公室的中国人的说法相比,这些说法在语气和内容上有相当的代表性。我在这里引述这些说法并非是因为是出自当局者之口,而是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也只是在这两例中,为他们的说法多少提出了佐证。

从这个证据的性质看,可以指出:没有提出有关双重国籍指责的证据;但是如果有,也还是可以指出,在伊宁航线上飞行的最能干的驾驶员有权说他是美国公民,但中国人却认为他是中国人,因为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国外出生并住在国外;(2)中国人自己也常说,一个人在十分严酷的审讯中,是什么都会说的;(3)有两个镇都叫霍尔果斯,一个是中国的,另一个是俄国的,彼此相距半公里;苏联政府无法控制最接近水

定和伊宁的霍尔果斯所发生的一切；(4) 如果以拥有苏制军火证明苏联共谋，那么也可以同样公平地说，美国在整个东半球从事鼓励革命四十年，而且还是日本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5) 其他说法中没有一项有如他所描绘的情况的目击者作证；谁看见卡车灯光？他如何知道那是卡车灯光？哪个驾驶员能说出他的飞机是被苏联领事馆射击的？如果按以前的说法，乱民集中在苏联领事馆周围并配有充分的机枪，哪位目击者能说出他走到相当靠近的地方，看清这些机枪确实是架设在苏联领事馆墙上，而不是架在经过仔细选择的邻近领事馆的墙上？(6) 关于请柬，可以这样说，即使这是一份真请柬，仍然没有说明仅有一份请柬，而另外 299 名所谓的客人没有得到请柬是怎样去赴会的。

还有需要叙述两个能说明迪化政治气氛的事件。在因中国确信苏联政府正在攫取大片中国土地而引起的紧张局势高潮中（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断言，从伊宁到沈阳一切都处于危险关头），苏联代理总领事叶夫谢耶夫和他的馆员康斯坦丁诺夫领事拜会了朱将军。在讨论了他们的业务以后，朱请两位来客饮酒，他们表示欢迎并按照俄国方式，开怀畅饮，在频频对酌中感到越来越融洽。最后，康斯坦丁诺夫向朱将军保证，他们认为朱是一位明智的人，愿做一切对他有帮助的事。并问他是否会有一天来共进晚餐谈些事？如果他愿意，一次小型宴会，只有他们三位。然后两人告别。

事发当天，就有人将这一“事件”以一份长电报秘密向蒋委员长报告，极力断言苏联人正在试图用欺骗盛世才的诡计期望朱绍良；他们制造伊宁事件，使朱在镇压中不可避免地要有他们的支持，一旦朱依靠他们，朱就必定遵照他们的而非中央政府的命令行事。然而，委员长确信朱不会这样干，也不会去赴宴会。

（以下仍为详细报告）

甚至据说，盛本人对省府事务仍然保持实际的影响，而且尽管现在的省主席和司令官都是能干、热诚而心地善良的人，但政府的行政则操在二陈系手里，似乎不可能在今后可能发生的事件中采取迅速、切实而

独到的行动,把新疆从日益逼近的甚至比当前暴乱更为严重的影响中解救出来。

V、结论

观察伊宁暴乱的人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想必暴乱的确不像是由苏联实地煽动起来的,因为该省的目前局面是,苏联要做的是继续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他们完全相信,由于中国人近于病态地缺乏面对事实的能力,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中国人统治新疆的权力也将消耗殆尽。如果做了任何事,恰好证明中国所轻易编造的所谓进行了干涉的指责,只会削弱苏联的地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坚信罪责全在苏联,这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中国曾经遭受极大的折磨和过分的痛苦;说部分痛苦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也是过甚其词,就新疆而言,即使最温顺的各族人民,也认为年复一年的粗暴统治只能引起叛乱,以反对统治他们的少数汉人。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就很好,但是如果不尊重包括被统治的 97% 人口的情感,在非常危急情况下,他们就要为过失或疏忽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新疆,汉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现在正处于危急关头,必须应付一些比英国人在香港受到的指责多得多的错综复杂情况。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能面对现实,而一定要像水手亚哈那样,使自己相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一只大白鲸干的,它净干坏事,而当他们以疯狂的仇恨追逐他们的白鲸时,海水吞没了他们。

FRUS, 1944, pp. 817-821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 第 504—507 页

霍勒斯 H. 史密斯^①备忘录

华盛顿, 1945 年 1 月 11 日

请参考 1944 年 10 月 10 日迪化 23 号发文, 其中扼要介绍了引起

^① 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二等秘书。

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更换的事件。

我在1944年7月19日的报告中着重指出：由于盛世才的阴谋，可能需要对苏联将要采取的政策重新予以考虑。但是我相信，新的消息只能减少这种可能性，不能改变苏联机构可能正在鼓励和支持新疆叛乱的看法。

更换盛世才后，吴忠信和朱绍良得到了一些关于新疆形势的消息。他们重新估计这些消息后，开始对吴特派员和罗家伦博士过去提供的一些消息产生怀疑，据说他们的消息来源于盛世才向他们和向委员长提供的报告。

传说哈萨克人从新疆越境走私货物，从俄国越境走私军火是受苏联边防军支持的，所以和苏联边防军发生冲突。这是盛世才一面之词，缺乏直接证据。不过，鞑靼人和其他非汉人的活动证明，吴特派员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说哈萨克匪帮武装齐全，使用俄式步枪、机枪和迫击炮。对于吴的苏联几乎公开援助哈萨克人的说法，私人无法核实。但是吴和罗都认为报告的内容是正确的，他们口头但正式讲述这些情况，并保证他们自己对每一情况都在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些报告的可靠性表示满意。根据以上情况，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的说法，所以具备条件向国务院报告。

关于上述问题，在我的23号报告中已经指出。盛世才完全有可能利用传说中的共产党阴谋来说明他的一系列逮捕行动，包括四、五、六、七月大量逮捕当地公务员和八月间逮捕新疆省政府中重庆任命的官员，这些完全由盛策划的行动，再加上酷刑逼出的“自首”和“证据”，使得盛及其心腹赴重庆之前把目击他们暴行的人一网打尽。

另一方面，哈萨克人袭击和伊宁叛乱仍和上次报告所述，未发生任何其它情况。根据中国人的报告，在没有任何反面证据的情况下，我曾经于1944年7月19日送上一份题为《苏联可能在新疆推行建立一组半自治国家的政策》的报告，其中扼要说明苏联立场，仍然可以用它解释过去几个月中苏联在新疆采取的行动。同时，从中也可以找到有关

盛世才阴谋的一些根据。

有一些突出的问题简要回顾如下：

1. 1944年11月13日我告别时,发现苏联总领事馆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上面把原来中国现代地图上划着的外蒙和新疆边界随便擦掉,按照去年春天的苏蒙位置用墨水深深地划上一条新边境线。1944年4月1日塔斯社新闻稿中已经表明,苏联支持这条新边界线的挑衅性立场,将8万多平方公里富饶的新疆领土划给蒙古。

2. 有一些边境地区可能存在争议。根据吴特派员的说法,中国中央政府对这种可能性非常关切。正对上述地区秘密进行测量。

3. 从鞑靼人和其它非汉人方面得到的证据,表明哈萨克侵袭小组的大多数煽动者和带头人不是苏联公民就是多年在苏联受庇护的新疆居民。这些鞑靼侵袭小队使用的步枪和军火除了苏联供给外,别无其它来源。他们大胆的袭击范围离省会不到五英里。暴动已经从阿尔泰迅速扩大到塔城和伊宁地区,这种情况说明,他们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

4. 没有苏联军火,苏联如不答应给予支援,1944年11月7日住在伊宁及其附近的1000名鞑靼人和白俄根本不能举行叛乱。中国方面向罗伯特·S. 华德领事的报告中,预料会成立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参阅1月2日下午2时重庆1号电报。)

5. 如果将恢复关系后首批大规模逮捕300名苏联书店主顾作为“新”政策的实际样本的话,那么迪化苏联领事人员对由于盛世才被调走而引起的中国对苏联政策的任何重要变化进行讽刺挖苦就都是有道理的。新政权可能不太公开地反苏,但结果必然一样。

6. 众所周知,苏联的总政策是设法保证所有毗邻国家的政府都对苏友好。但不能忘记以下几个因素:在战略价值方面,新疆的东部边界比西部边界特别容易防守,另外,新疆还有油田、金矿、钨矿和畜产品等。

评论意见:虽然我不得不相信我23号发文中关于以上问题的内容。但是传说中有关盛世才的阴谋可能根本不存在,也许是盛故意打

出的牌,为自己找安全出路。不过,这一阴谋部分地存在仍然有可能。直到盛去重庆接受新职务一个星期之后,整个局势处于动荡状况,结果难以预料。今天还不太清楚苏联和中国在新疆有关地位和势力的角逐结果。中国不惜一切要坚持住,看样子苏联打算不费什么力气使新疆回到它的怀抱或者再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对中国和苏联在新疆的真正企图以及它们互相摸底的结果只能进行猜测。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盛世才已被撤换,现在新疆严重的暴乱仍在继续。我认为我在1944年7月9日第11号发文中预料的第二步正在实现。不过,如果真是那样,还看不出中国方面要下大力量改正他们自己行政上的错误。就是这些错误使当地人民和苏联对中国丧失信心。

FRUS, 1945, Vol. 7, pp. 988-990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507—509页

赫尔利致斯退丁纽斯电

重庆,1945年1月19日下午2时

1. 以下为迪化领事发来的报告:接续1月12日的会谈(参阅1月17日大使馆80号发文),朱将军表示,他相信叛乱是苏联唆使和指挥的。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像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问题同样紧迫。苏联已经决定新疆必须建立一个受它控制的政府。但是,朱又说:叛乱份子的宣传继续拥护土耳其斯坦应回到回族手中。宣传并非共产党性质。(朱对军事形势悲观的看法受到省主席公开赞成。)

2. 领事表示他相信上述朱的意见是坦诚的。也就是说,朱对他的谈论并非仅仅为了宣传,我们在此间中国人当中的日常消息提供人,一般对新疆局势的发展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对讨论抱谨慎态度。没有出现1944年4月那种反苏宣传浪潮。

FRUS, 1945, Vol. 7, pp. 992-993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509—510页

赫尔利致斯退丁纽斯电

重庆,1945年5月5日上午8时

以下为迪化领事华德最近发来的电报内容摘要:

1. 精锐增援部队的到来(4月18日下午3时大使馆643号报告),似乎表明新疆和兰州的交通并未被切断,叛乱分子攻击迪化也未获得成功。但是维持这样大的军事设施所费不貲,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和在当地居民中产生不满情绪。无论如何,形势继续紧张。当局已经发出一系列新的逮捕命令,据说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叛乱分子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喀什地区。

2.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4月16日抵达迪化,4月25日前往重庆。在访问迪化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和蒋经国进行一系列友好商谈。华德称:从他到达迪化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方面寻求苏联友好的真诚努力。蒋经国也于4月25日赴重庆,但乘的是另一架飞机。他由吴忠信陪同,吴已提出辞职,可能不再返回新疆。

FRUS, 1945, Vol. 7, p. 1000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512页

赫尔利致斯退丁纽斯电

重庆,1945年6月16日下午4时

根据华德发来的电报,对目前新疆局势作出分析如下:

1月间中国在伊犁河谷遭到败绩,接着五月间迪化阴谋破产,结果形成僵局。这个僵局应该能提供一个按纯粹国内事务方式解决叛乱问题的机会。但是,根据李楚农特派员和其他了解情况的人传来的消息,中国当局不愿再费力气设法就地解决,也不打算进一步采取武力解决。据说朱将军相信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达成协议,因为他坚信叛乱是苏联授意的。但是,英国和美国领事们的意见一致认为,叛乱不是出自苏联操纵,而是大量的内部原因引起的。虽然在边境的苏联一侧很可能存在着对叛乱分子不言而喻的同情,特别是在同一种族的成员中。

为了支持这种想法,华德举例说,有证据表明,叛乱活动显然缺乏全面领导。例如焉耆西北的叛乱分子攻击城市一个多月终归失败,这表明他们没有利用北疆连续不断的骚动和中国在南疆明显的防守虚弱。

有人秘密地告诉华德说,早在六月间,特派员根据中央政府命令,曾经通过苏联总领事,请求苏联调解叛乱事件。据说总领事建议这个问题应向莫斯科提出。按照特派员的说法,莫洛托夫和宋子文将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

送呈国务院,抄至莫斯科。

FRUS, 1945, Vol. 7, pp. 1001-1002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512—513页

朱绍良致周至柔电

1945年9月5日、7日

(一)查乌苏申微八时三十分发现三星红徽符号重轰炸机二架在乌投弹八枚,四枚命中新二军司令部,炸死勤务传令兵数人(根据谢军长申微十时电)。(二)微晨八时半,精河上空发现飞机五架,重轰炸机一架,两翼有紫红色徽星,更番轰炸扫射,据降匪供称,将有四十八架飞机,分批在河沿基地降落(根据郭师长申微电),沙子山被匪炮击及轰炸,五七一团两连全部殉国,碉堡大半被毁(郭申微十四时一四分及一八时一八分两电)。(三)虞日晨,匪机两架,在乌苏投弹五枚并扫射,另一架盘旋后逸去(根据乌苏电台一二时〇〇防空情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761—762页

甘乃光接见彼得洛夫纪要

1945年9月7日

甘次长:今天请贵大使来,为要面谈一件事情,乃据新疆来电报告:(一)、(二)、(三)、(四)。

大使:本人关于贵次长所述各事实,无任何情报。这些事实似须详